

论社会性小农与现代农业新技术的衔接

——基于广西平原地区农技推广服务的考察

冯川

(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 在缺乏良好社会组织机制的普通农业型地区,“现代农业与小农如何衔接”的问题可锁定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如何衔接”的问题。“社会性小农”的本质特征是“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定位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和行为时间”。由于“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使用的型构,农技推广服务所供给的现代农业新技术在试图取代或转化“社会性小农”所自发选择的农业技术时遭遇了严重梗阻,农技推广服务与“社会性小农”之间出现适配困境。故此,农技推广服务就只能绕开小农的“社会性”寻求突围。干部的示范和带头作用,小农家庭发展观中的契机,以及边缘生产者对农技指导的渴求,都在“社会性小农”的生产逻辑之外,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生产的有效衔接预备了空间。

关键词: 现代农业技术;社会性小农;农技推广;农民行为逻辑

中图分类号:F3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2013(2019)06-0001-11

O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social small-scale peasant and new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in Guangxi Plain

FENG Chua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In common agricultural areas without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 the question of "how to link modern agriculture with small-scale peasants" can be locked into the question of "how to link new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ies with small-scale peasants".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small-scale peasant" is "to locate and determine one's own behavior and time in comparison with others". Due to the structure adopted by "sociality" for agrarian production technology, the new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provided by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encountered serious obstruction, so the adaptation dilemma between th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 and "social small-scale peasant" appeared. Therefore,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services can only bypass the "sociality" of small-scale peasants to seek breakthrough. The demonstration and leading role of cadres, the opportunity in the development concept of small-scale farmers' families, and the desire of marginal producers for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guidance are all outside the production logic of "social small-scale farmers", providing space for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al new technology and small-scal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Keywords: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social small-scale peasant; promotion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logic of peasants' behavior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农业的发展,事关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稳步提升。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收稿日期:2019-11-28

作者简介:冯川(1989—),男,四川资中人,东京大学博士,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特聘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基层治理和农业经济。

的意见》，围绕如何提升小农发展现代农业的能力、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以及完善小农扶持政策等问题，提出了相关意见^[1]。

现代农业拥有丰富的内涵，其特征一般可以归结为工业化、科技化、产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20世纪50年代，中国就开始提出了“农业现代化”的口号，与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合称“四个现代化”。经过农业集体化运动和人民公社对农业经营方式的改造，当时的农业电气化和机械化等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在农业组织化的前提下得到了较好展开。而在8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之后，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复归小农家庭，大大弱化了农业组织化程度。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的农村又陆续出现突破小农家庭、重新实行农业生产组织化的情况，一些研究纷纷指出，小农与现代农业的衔接，需要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同时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小农的利益联结机制，实现小农家庭经营与合作经营、集体经营、企业经营等多种经营形式的共同发展^[2-4]。

学界对现代农业的关注多聚焦于具体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和农业经营规模，很少有学者思考，就经济发展并不突出的普通农业型村庄^[5-6]而言，现代农业对它们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上，在数量上仍然占多数的普通农业型村庄，80年代以后就基本不再存在超越小农家庭的经营主体，也不存在与企业资本进行联合的区位优势，因此小农家庭经营仍然占据主流地位。对于生活在普通农业型村庄的村民而言，在顶层设计者眼中原本内涵丰富的现代农业往往被简化并等同于“现代农业新技术”。而在普通农业型村庄占压倒性多数的乡镇，现代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也就是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服务，面向一群并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小农的推广服务。由此，“现代农业与小农如何衔接”这一问题则被具体化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如何衔接”。

现代农业新技术要能顺利落地，少不了基层农技推广和供给服务的基本队伍，他们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近年来，伴随着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的建设和完善，基层农技人员的能力得到了巨大提升，已有研究多只关注自上而下的农技推广过程和农技推广队伍的人才建设^[6-12]，而未触及现代农业

新技术与小农的衔接问题。笔者认为，就普通农业型村庄而言，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的衔接问题，关键在于农技推广服务队伍的建设本身，而在于在充分理解小农固有的生产行为方式及其特点的基础上思索农技推广和服务究竟应如何与小农社会和农民的生产需求进行对接，以及农技推广和服务的担当者应如何与小农进行互动。

基于此，本文拟先分析普通农业型村庄小农固有的生产行为方式，探讨其“社会性”；在此基础上，以广西平原地区W镇的普通农业型村庄为例，考察目前基层治理实践中的农技推广服务与小农固有的生产行为方式的衔接；并以经验调查为依据，为现代农业新技术有效衔接“社会性小农”提供可行方案。

二、“社会性”：普通农业型村庄小农固有的生产行为特征

在当下中国，小农生产作为农村家庭兼业生计模式的重要一环，担负着村庄社会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功能，保障着城市化进程的有序展开。对于普通农业型农村而言，推广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回应小农生产的真实需求。现代农业新技术推广服务将小农生产作为瞄准目标，而若不能准确把握小农的生产特点和行为逻辑，必然会出现服务偏移。

在小农生产行为研究方面，既有的研究大致有三个重要理论流派：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阶级小农”论、实体主义学派的“生存小农”论和形式主义学派的“理性小农”论。在“阶级小农”视角下，小农是一个生活条件相同、生产互相隔离却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这个阶级的最大特点，就是生产方式落后、阶级意识薄弱。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生产，缺乏社会分工和对先进生产技术的应用，生产资料多来自与自然的交换而非社会交往，保守倾向明显的农民就像一个个分散的马铃薯，并不会以自己的名义维护本阶级的利益^{[13]109-112}。而以恰亚诺夫的“劳动—消费均衡论”为基础的“生存小农”论，则强调小农是家庭式的生产方式，其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生存需要，而非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由于家庭本身就是小农独特的生产组织体系，小农的经营状况会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

而波动^{[14]41-58}。斯科特基于东南亚小农社会的考察指出,小农的生存伦理植根于经济实践中,农民更关注“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15]1-12}。换句话说,农民的经济行为植根于农业社会的道德伦理而非经济理性。与“生存小农”论相对,以舒尔茨和波普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论者则强调,小农的经济行为和资本主义企业家或西方资本农场主有着同样的经济理性逻辑,他们的行为遵循成本与收益的理性计算原则,而非群体利益或道义价值观^[16,17]。“理性小农”论者认为,小农也是理性投资者,会为追求最大利益而做出合理生产选择。

基于以上三种论断,黄宗智认为中国小农是“综合小农”,即同时存在“阶级小农”“生存小农”和“理性小农”的面向^{[18]1-7}。然而在国家提出促进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背景下,我们对于小农生产行为的研究重心,迫切需要从对行为性质的关注转向对行为发展指向的关注上来^[19]。所谓发展指向,即意味着小农的生产虽然以家庭为单位,但仍有可能与现代农业有效衔接,并指导下一阶段的生产和发展。这种发展指向,也意味着小农生产行为本身外部性的无可回避,这是小农生产过程中潜藏的社会性的一面。小农生产行为的发展,毕竟要在小农社会当中展开。

为了把握中国小农生产行为的社会面向,在一些研究中“道义经济”范式被进一步演绎为从“伦理本位”出发而“互以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家族集体主义^[20]和整体主义^[21]的行为逻辑;而“阶级小农”和“理性小农”范式则被置于“差序格局”这一社会结构之下与农民的“自我主义”一同阐释^{[22]24-30}。由此,对中国小农行为之社会面向的研究,就基本被转化为对小农在行为和意识中如何处理集体利益与个体利益之关系的研究。以此为线索,既有研究将中国社会简化为传统时期、集体化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三个典型时期,梳理小农生产行为中集体主义意识与个体主义意识的权重关系在这三个时期中的差异,并将该研究内容谓之“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23]。

上述研究范式的问题在于,研究者们其实仅仅关注的是小农生产行为目标的利益属性,即小农究竟是为实现个体利益还是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行动。然而,“小农生产行为目的的逻辑”并不等同于小

农行为逻辑的全部,“小农生产行为目的的逻辑”并不能用来理解“小农行为方式的逻辑”,因为“小农生产行为方式的逻辑”并不是由“小农生产行为目的的逻辑”所决定的。特别是在分田到户使农民的农业生产从社会主义集体中脱身出来之后,用“小农生产行为目的的逻辑”来代替对小农生产行为方式逻辑的解释,对于小农的生产行为选择和特征其实是缺乏解释力的,因为“小农生产行为目的的逻辑”无法回答小农对生产行为方式的选择问题。比如,“小农生产行为目的的逻辑”无法解释基于个体利益的小农仍有可能形成互助合作,但这些小农却又有可能拒绝采用能够提升个体利益的农业技术。

要言之,我们必须在小农生产行为目的之外,寻找对小农生产行为方式的恰当把握。因为小农生产行为方式本身,所显示的就是小农对固有农业技术的操弄方式,而这正是现代农业新技术推广服务的瞄准目标。明确了小农生产行为方式,也就明确了现代农业新技术推广服务的瞄准目标。

那么,如何把握普通农业型地区小农的生产行为方式?笔者认为,应着眼于小农生产本身潜藏的“社会性”,同时,应意识到普通农业型地区的小农是“社会性小农”^{◎[24,25]}。

小农生产“社会性”的表现方式并不局限于“生产合作”这一点上,即使小农生产的过程并不是与其他小农进行合作生产的方式展开的,但小农生产本身也一定是“社会性”的。这是因为,小农生产并非单个农户家庭在抽离村庄社会的封闭空间中独自展开。从空间上看,分田到户以来所形成的“零细分散错圃制”,使得小农之间的土地插花分布、相互高度嵌入。从时间上看,虽然农作参差期赋予了小农生产以时间弹性,使小农的生产合作成为可能,但这种参差性毕竟有时间上的限度。尤其在全年适合种植、多种作物轮作周期衔接紧密的地区,农业生产的快节奏化更使得农作参差期不断受到压缩,小农之间在每个农作操作阶段的同时性则愈加明显。

由此可见,单个小农家庭的生产是在与其他小农家庭生产的相互参照与时空的高度嵌连状态中展开的。所谓小农生产的“社会性”,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定位和决定自己的行为

和行为时间”，这也正是小农生产行为方式所依循的基本逻辑。

三、“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使用的型构

W镇及其所辖农村皆属于普通农业型地区，面积共计148.51平方公里，人口4.1万人，镇政府所在地距县城20公里。当地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水量充沛、日照充足，适宜常年种植各种农作物，是农技推广服务开展的典型地区。区域内极少发现组织化或企业化的农业生产。本文包括访谈资料在内的经验材料皆来源于笔者在W镇所做的质性调查。

水稻和糖蔗是W镇主要的农作物。从事农技推广服务工作的乡镇干部表示，在当地推广抛秧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并不顺利，许多经验丰富的农民根本看不起或者不相信入村推广农技的年轻人，更不会听从或主动寻求来自这些乡镇干部的生产技术建议，似乎村庄内部存在着一个阻挡农业新技术进入田间地头的结构性力量。事实上，这些乡镇干部感受到的结构性力量，正是来源于“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定位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和行为时间”的小农的“社会性”——普通农业型地区的小农生产虽然以家庭为单位展开，但其生产过程却并不处于孤立状态，而是浸入村庄社会之中，与他人的生产活动勾连在一起。因此，“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形成型构。围绕小农的水稻和糖蔗种植，我们发现“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的使用形成以下三种典型的型构。

首先，种植水稻的小农会相互比较水稻的细密度和齐整度等种植状态，这导致小农会选择并强化能够实现细密齐整状态的水稻栽种技术的使用。当然，将水稻的细密度和齐整度作为比较对象，与“社会性小农”从日常生产和生活经验中所获得的“知识库存”有着密切联系。在生产阶段小农无法确实估计产量，但在与他人的比较中，小农的种植行为之所以呈现出一种保持种植细密度和齐整度的趋向，是因为他们认为“越细密、越齐整，则产量越高”。根据笔者在W镇的调查，小农在进行社会性的生产比较时，往往在生产状态与收获状态之间预先建立心理关联，这种心理关联首先通过单纯的视觉进行信息输入，然后通过直觉思维对视觉信息进

行加工，并想象这种加工的有效性。在生产环节中，作物种植的细密度和齐整度，是为数不多的可以通过直观的视觉加以获得的外在特征。在小农的直觉思维中，细密度直接隐喻着收获的“细密”，预示着丰足的产量。而齐整度，则表现出一种理性的秩序感。在不受人意志所控制的自然气候和天气变动面前，小农生产向来充满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在W镇，这一点则表现为经常性的洪涝灾害。追求安定的小农，对无序、随机和不可掌控的自然表现出本能性的抵触和厌恶，因为无序、随机和不受控制几乎就暗示着天灾的降临。文化程度普遍未及高中的小农，当然无法科学分析细密度与齐整度背后的科学依据。他们只是依据自身的生产经验，通过相互比较而产生的“社会性”不断确证着这种用直觉思维建立起来的心理关联。基于此，社会性小农逐渐将作物种植的细密度和齐整度作为判断农户是否勤快的社会象征。W镇下辖的农村属于拥有主导姓氏的宗族性村庄，村民们聚族而居，形成血缘与地缘的结合体。村民通过祭祖和添丁，将自身的存在与祖先的历史和宗族的未来勾连在一起，从而建立起自身对宗族和村庄的身份认同。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家务劳动和农业劳动中发挥着更为基础的角色。男性的活动会影响到家庭和农业的发展，但女性的活动则直接关系到家庭和农业根基的稳固和平稳状态的维持。作用的基础性，意味着作用的持续性和长期性。女性在农业劳动中的基础性角色使之往往“在地里过一天，自己带吃的，自家干完，又去打小工”（20190517 韦 JL）。为了在夫家立足，嫁入村庄的女性之间会形成一种暗自较劲的竞争，这也正是女性证明自己的一种方式。负责插秧的女性必须通过插秧的细密和齐整，证明自己的勤快以及对丈夫参与社会交际和人情建构的支持。

其次，小农之间还会相互比较水稻耕整、播种和收割等生产环节的时间。以自然生物为操控对象的农业生产固然有其自然时间节律，但自然时间对于社会性小农而言只是框定出了一个粗略的时间区间，具体的农作时间则是由在相互比较中所形成的社会时间所规定。所谓社会时间，即是小农在相互比较和协调之后达成一致的不成文的农作行动时间规划，它是对自然时间的集体加工和操作化。耕整、播种和收割等活动，因其无组织、无共同目

标的特征,而可被归入小农的“集体行为”^{⑤[26,27]}一类。在 W 镇所辖村庄,诸如耕整、播种和收割等活动的展开,都以服务于个体小农的利益为目标,并不存在产生“集体”想象的空间。但即便如此,并没有被组织起来的小农却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进行着一致的集体行动。如果从发生学的视角看,小农在生产过程中这些看似一致的社会行动状态,其实是起初与大多数农户的行为不相一致的少数小农逐渐扩散其行为影响的结果。笔者将与大多数农户的行为不相一致的少数小农逐渐扩散其行为影响,最后使大多数农户在行为上相继趋同于少数小农的方式,概括为“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在“协商缺失的被动协同”方式中,大多数农户会选择调整自己的行为,最后达成与少数小农在行为上的一致。那些无组织、无共同目标的集体行为,在达成一致的状态之前,基本都经历了被动协同的过程。比如,在耕整环节,承包地远离交通路的大多数农户,不得不与承包地靠近交通路的少数农户在时间上保持一致;在收割方面,由于机械化服务更偏好于以相邻成片的农田为服务对象,种植面积分散的农户为了方便雇请收割机,也不得不在时间上与种植面积大的农户保持一致。上述小农集体行为的形成过程,都发生在所谓农作参差期中。农作参差期表现为一个生产环节所应进行的时间区间,大部分农户都能大概说出农作参差期的底线时间。农作参差期的自然时间,会因地理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差异。而由当地农户亲口说出的农作参差期,都是社会性小农在长期生产的相互比较中历史地形成的社会时间。历史传统给予农作参差期以正当性,并赋予劳动力投入与产量之间以因果关联。此外,由于小农生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小农在相互比较中达成生产作业的同步,有利于分散生产风险,获得安心感。因为一旦某农户的水稻收割虽仍处于农作参差期中,但若迟于大部分小农收割的平均日期,则该农户的水稻就将成为牛、鸟和老鼠集中采食的对象(20190523 曾 X)。

第三,种植糖蔗等经济作物的小农之间,会在相互比较中隐藏技术的特殊性。对农业新技术的采用,意味着在村庄中“冒尖”,而这在普通农业型地区的保守村庄中是极为忌讳的行为。因此,“社会性小农”本身有阻碍农业生产技术发展变迁的一

面。在以 W 镇为代表的宗族性地区的小农社会,甚至兄弟之间也不会相互交流农业技术,当地村民说“两兄弟都不懂你用什么我用什么”。但外嫁的姐妹与兄弟交流较多,甚至告诉兄弟更能挣钱的作物品种,向兄弟详细介绍种植的成本和方法。一个刚刚学种新经济作物品种的农户,是无法从周围长期种植该经济作物的农户那里学到经验与技术的。作物长势稍差的农户若问作物长势较好的农户何以如此,作物长势较好的农户“表面上是会讲大家都懂的一般道理,但是核心、特殊的东西不讲”,或者说“我和你都是用的同样技术和肥料,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而他早已在农药和肥料用完后就将一切能表征农业生产新技术的包装袋烧掉了(20190529 何 ZR)。那么,兄弟之间、农户之间故意隐藏技术的特殊性,是否因为宗族性地区的兄弟之间和农户之间处于激烈的经济竞争状态呢?其实并非如此。与在不断处理婆媳关系、妯娌关系的过程中始终隐忍而抱持危机意识和在与其他女性的比较中经常带有急切的攀比心的女性不同,宗族内的男性之间则不存在太强的竞争意识。在宗族社会对男性角色的期待中,男性因作为主要收入来源而掌握经济权,因作为血缘认同的承载主体而掌握宗族内的话语权,也作为资源整合和动员的对象而在分家中参与基于父权的统筹过程。父子一体的伦理观,统合并产生了兄弟一体的伦理秩序。在父代的整合作用下,兄弟之间会形成经济上的互助连带关系。在兄弟中有人在教育、婚姻、生活等家庭发展方面产生需求时,其他兄弟将会给予经济上的援助。在当地的伦理观念看来,能力强大的儿子就应该为联合家庭付出。依靠父代权威保证的兄弟合力和相互帮扶,起到了扶弱济贫的作用。能力强大的儿子的强回馈责任,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小家庭的发展能力,但却使子代小家庭间的差距不会过于悬殊,并在村庄内宣示着兄弟间的团结。兄弟间若不团结,将遭到村庄舆论的嘲笑。丈夫对大家庭整体安排的服从,以及竞争意识的淡漠,就压制了妻子之间的竞争,使其始终处于不外显、不伤害他人利益的克制状态。另外,在宗族性村庄中,某个家庭比其他家庭在经济层面更具有竞争性并不能使其成为“有面子的人”。相反,“有钱不为村里做事,就没有面子”(20190524 陈 NT)。一个满

足了集体对个人奉献行为期待的村民,就会被村庄定义为“有面子的人”。也就是说,村庄内的普通农户之间没有必要在经济生产方面展开竞争。其实,兄弟之间、农户之间故意隐藏技术的特殊性,并不是基于竞争心理。恰恰相反,其行为逻辑在于通过在社会性的比较过程中显示与他者的“一致性”,从而回避小农生产中出现社会性竞争。

从以上社会性小农行为逻辑的具体表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性小农行为方式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他者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定位和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在无组织的、自发的相互比较中,追求可视化的表面一致,回避对“特殊”的真实展现。在小农的行为逻辑中,“特殊”就意味着社会性孤立,就意味着独自承担风险,以及对家族和村庄社会整合关系的破坏,甚至遭受村庄舆论的批判。而小农生产中所展现的“一致”现象,并非出于整体设计或集体协商。种植状态、种植时间的趋近一致,以及交流中对种植技术一致的强调,都是社会性小农在经年累月的相互比较和自我调整中,无组织地自发产生的生产和生活技巧。

四、“社会性小农”与农技推广服务的适配困境

“社会性”对小农农业生产技术使用的型构,其实反映出农业生产技术并非处于一种纯粹中立、价值无涉状态。农业生产技术本身具有政治性,因此农业生产技术本质上是对社会条件的反映,技术的物质性存在本身就包含特定的政治关系^[28]。我们不能忽视农业生产技术普及过程中社会选择的重要性,农民是否采用特定的技术或何种技术、选择如何具体设计和安排现有的技术,与农民的“社会性”紧密相关。那么,我们考察农技推广服务对小农生产意味着什么,其实也就是考察农技推广服务及其供给的现代农业新技术与“社会性小农”及其自发选择的农业技术是否适配,归根结底,即是考察小农社会对现代农业新技术作何反应。

事实上,从W镇所辖村庄的实践经验来看,农技推广服务所供给的现代农业新技术,在试图取代或转化“社会性小农”所自发选择的农业技术时遭遇了严重梗阻,“社会性小农”与农技推广服务之间出现适配困境。以W镇所辖村庄的经验为例,本文将这

种适配困境总结为以下四对关系。

(1) 直觉思维、伦理关联与科学思维、科学关联的适配困境。在社会性小农的行为逻辑中,直觉思维构建了水稻细密度、齐整度与产量之间的因果关联,并将细密度和齐整度视为农户“勤快”的表征,使作物的种植样态具有了引发村庄社会评价的功能。然而,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用阳光照射、通风等科学变量来解释种植样态与产量之间的因果关联。这样的解释颠覆了以细密和齐整为优的价值序列,并为抛荒技术的推广做好了理论铺垫。抛秧技术直接在视觉上冲击了小农生产对细密度和齐整度的追求,同时也从劳动时间和劳动投入量上冲击了小农对“勤快”和“辛苦”的价值认知。与工业技术推广相比,农业技术确证有效的自然周期更长。在社会性小农的行为逻辑中,农业生产方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是直接可以通过直觉思维与村庄中他者的比较而自我定位、自我确证的。虽然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从科学角度重建了农业生产中若干要素间的关联,冲击了社会性小农的行为秩序和价值结构,但还无法立即用可视化的经验事实证明其对社会性小农造成冲击的正当性。如果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无法用经验事实说明新技术的有效性,社会性小农将不会主动放弃其固有的行为秩序和价值结构。要使小农亲眼确证和信服新技术的优越性,就必须经过若干生产周期。

(2) 风险规避优先与效率提升优先的适配困境。社会性小农在长期生产的相互比较中历史地形成了农作参差期,生产行为无组织地自发趋近于一致,也有助于分散生产风险、对接自发的农业机械化。然而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则往往从提高个体农户的生产效率着眼,打破在生产活动中实践已久的农作参差期和生产节律,使小农的社会性存在瓦解的可能。因效率提高而改变播种、收割时间,进而变得特殊的少数小农,也有可能聚集生产风险,放大小农的孤立感和不安。

(3) 消极保守与积极革新的适配困境。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的一线人员,一方面比普通的农民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能够深入解释和解决病虫害导致的作物生长问题;另一方面,又比农业院校出身的高学历人才了解更多当地的特殊病虫害,拥有更多实地工作经验。在实地工作中,病虫害不仅具

有地域特殊性,而且也在随着农药的引入和升级而发生变化,“你有更好的药出来,就有更厉害的病菌出来”(20190529 何ZR)。因此,不仅靠书本知识无法解决实地工作中的问题,就是靠社会性小农在长期生产的相互比较中历史地形成的经验,也同样无法应对持续出现的新问题。正是由于农业技术需要在实践中时常更新,政府也会组织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的一线人员到各地不断学习,他们也会经常到各地的田间地头走动,不断更新自己的经验。但社会性小农往往只看到肉眼可见的病症,然后将该病症与既往的案例或他人的案例进行比较,从回避特殊性且有限的社会关系和历史经验中寻求解决方案。特别是一些对同一种作物已有数十年种植经验的农户,他们更相信从社会关系和历史经验中找到的解决方案。即使他们自己找到的方案并没有明显效果,他们也还是执着于自己的选择。在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的一线人员看来,这些农户正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一群人(20190529 何ZR)。

(4) 农资依赖与自主选择的适配困境。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的一线人员并不会强制农户采用新技术。是否采用新技术,归根结底都是小农的自主选择。政府只是用入村宣传或赶集时在街上摆摊发放宣传单并讲解的方式引导小农更新生产技术,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到各村指导小农防治病虫害也都是免费服务。当然,卖农药的农资店也会指导购买农药的小农如何治理病虫害。但是据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卖农药的农资店出于盈利考量,经常有意不会告诉小农有效且根本的防治方法,也不会主动教农户最合适的打药时间。这是因为,如果农户掌握了主动预防病虫害的方法,农药的销售量就会大受影响。从这一点来看,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农技服务工作与农资店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W镇农业服务中心在农技服务方面,日常性的工作就是瓜菜病虫害的抽测。工作人员会到农田中采样,预报病虫害,并上报信息,张贴宣传报,并究问农户作物病况,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其指导的重点不是病虫害的治理,而是病虫害的预防。自分田到户以来,普通农业型村庄中经验丰富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中对农资的依赖度显著增加。为了缩短生产周期、减少劳动投入、增加产量以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农户投入大量农药、化

肥等现代要素,进而出现为市场而生产和自家人而生产的“一家两制”现象^[29]。相比之下,柔性的农技推广显得软弱无力。

五、“社会性小农”环境下现代农业新技术的突围空间

农技推广服务与“社会性小农”出现适配困境,其背后即是现代农业新技术与“社会性小农”自发选择的农业生产技术无法有效衔接的困境。在此背景之下,带着供给现代农业新技术之使命的农技推广服务,就只能绕开小农的“社会性”本身,从小农生产或小农社会性的外围寻求突围。W镇的农技推广服务实践,凭此找到了使现代农业新技术与“社会性小农”相衔接的有效方式,为“社会性小农”环境下现代农业新技术突围提供了经验支撑。以下根据W镇的实践经验,对此分别展开论述。

1. 利用干部带动和示范寻求突围

在村民眼中,乡镇干部和村干部不是普通的民众,其身份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国家意志,因此其行动具有超越小农社会性文化网络约束的正当性。在现代农业技术的推广方面,村干部的带动和示范,能够起到从“社会性小农”的外围打开局面的作用。

W镇农业服务中心每年到管辖范围内的每个村委推广农业技术。1999年,W镇开始推广旱地育秧技术。该技术将使作物生长错开易产生洪涝的时期,避免水稻空穗。但旱地育秧技术会使秧苗看起来像枯萎的小草,直接对小农的直觉思维和心理造成冲击。另外,由于春节过后气温尚低,当地的小农通常要到春分的三月二十一日左右才开始播种。而旱地育秧技术要求把播种时间提前一个月,在春节前后就要开始播种。小农们因此都纷纷怀疑谷种是否能够存活,并指责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在“瞎指挥”。

2002年,W镇又开始推广抛秧技术。小农又开始对抛秧表示出集体怀疑,都认为抛秧会造成产量减少。农业服务中心决定通过村干部带头做示范,用一个生产周期向小农展示旱地育秧的可行性和优势。抛秧技术使插秧效率从一天达不到1亩的状态提升到一天完成2~3亩,抛秧的秧苗状态也打破了小农对插秧细密度和齐整度的惯性思维。农业

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宣说抛秧可以使水稻产量达到每亩500公斤,比插秧多100多公斤,但村民都觉得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是疯子”(20190523 曾 X)。农业服务中心就找村干部和镇政府的临时工做示范,镇党委书记也对他们“拍胸脯说,你不得吃,我陪你损失”(20190523 曾 X)。因为镇党委书记做出了保证,作为下级的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更需要保证示范田的成功,以致他们经常去了解示范田的田间管理,每个环节他们都需要亲自参与。在W镇,抛秧技术推广了2年左右,才逐渐被当地小农所接受。

村干部的示范,用提高的产量塑造了劳动力减省、时间变动的正当性,重塑了小农在生产环节中惯有的直觉思维和社会评价标准,证明了打破历史传统的可行性,化解了新技术不确定性的疑虑。此时,社会性小农需要在相互比较中确认和调整自身行为,不再阻碍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反而使现代农业技术在当地社会表现出“以点带面”的扩散特征。

2. 借用小农家庭发展观寻求突围

小农家庭的消费性选择相对区别于处在相互影响的整体氛围之中的生产性选择。农业机械作为一种现代农业新技术,表现较为特殊,因为其能否推广很大程度上关涉小农家庭发展观,而非小农生产的社会性特征。虽然用途仍是生产,但多数小农在认知中倾向于将农业机械的购置定位为一种消费性选择,其购置农业机械的心理状态和条件契机与购置家电等生活消费品并无二致。对于小农而言,农业机械并非缺乏需求弹性的生产必需品。在W镇这样的所辖村庄在村人口比例较高的小农社会,并没有自发形成普遍的农机雇佣经营市场,其原因与当地小农包括家庭目标、消费观念和代际责任观在内的家庭发展观紧密相关。

从农户实现家庭城市化的发展动力来看,在W镇下辖的大部分村庄,村民并没有表现出急切地追求城市化的期待,村庄整体呈现出内向型发展的价值面向。这与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地理区位有直接关系。由于广西的气候常年适宜种植多种经济作物,村内人均耕地面积大,村民通过种植经济作物就能获得相当于务工收入的农业剩余。再加上距离广东省较近,附近的乡镇也有制衣厂、电子厂、缫

丝厂、洗涤厂,村民务工兼业从1990年代就开始兴起,本地务工也使“离土不离乡”成为可能。此外,宗族的统合力量,也使村民与村庄事务产生紧密的意义连带,并具有叶落归根的心理预期。宗族的存在,也使村民缺少主动冒险的动力,在心理上依赖宗族的保护。大部分父代的学历仅达初中毕业,不高的学历也限制了他们在城市里找到稳定的立足之处。又由于村内对宅基地缺少行政管控和规划,村民可在其承包的旱地上随意建房,整个村庄和临近地域的生产系统就能够满足大部分农户的家庭再生产需求,使得进城生活的价值和必要性并不能得到突显。

而从农户在家庭积累方面的表现来看,村庄同时呈现出家庭积累能力较强和家庭积累目标分散这两个特点。一些妇女在抚养小孩的同时,还会务农、在附近打零工,而青年男性外出务工。这样的复合家计模式,提高了家庭积累能力。与此同时,由于婚姻成本低,以及可能产生于婚姻压力、城市化压力、教育压力的家庭再生产压力不大,代际资源在使用和配置上相对独立,父代对子代资助不多,父代完成人生任务的压力不大。再加上村庄内人情往来相对较少,所需人情开支金额不大,消费不高,家庭攒钱积累的动力并不强,使得家庭并不具有明确的发展性目标。当地家庭积累耗散于以改善生活或小农生产为目标的细小琐碎的生活性消费或者暂时的需求。需要聚焦和整合家庭资源的目标缺失,以及恰好能够支撑消费的收入水平,使农户不用考虑为积攒财富而回避即时消费,寻找其他降低成本的替代性方案。

同时,在W镇所辖村庄中,父代意识中对子代责任的终结具有清晰的时间点。父代意识中的人生任务终结的时间点,就是父代对子代不再负有责任和义务、父代对子代必须做的全部事项都已完成的时间点。父代对在子女结婚后开始自己相对自主独立的生活怀有期待。在子代都已结婚之后,父代就已完成人生任务,并开始转向代际独立的生活。而子代养老的义务观,与父代追求代际独立的生活观相重叠,就使得老年人在渡过老年的生活方式上存在可以自主选择的空间。如村民所言:“我们没钱就给他们讲,有钱就不用找他们。不会觉得为他们增加负担。他们2、3年前就叫我们别干活。我

觉得我能干就干，在家里坐着不好意思，能干的时候，让女儿和儿子给钱，也不好意思。我不能坐在家里。干活死不了人，还身体好，吃饭多，不得病。”（20190521 黄 CH）

家庭积累目标的分散，以及父代在人生任务完成后向代际独立的转化，为小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和普及预备了条件。W 镇农业服务中心正是借用了当地小农这样的家庭发展观，使目前插秧机在 W 镇的普及度已达 60%。插秧机能在半小时之内完成 1 亩地的作业，每台的价格为 6000~8000 元，并且小农在购买时还能享受中央财政补贴。由于插秧机使插秧间隔较为稀疏，阳光照射和通风条件使水稻长势更好，插秧机能够使水稻亩产量比抛秧提高 75 公斤左右。插秧机能够节省劳动力，满足种植面积 10 亩以上的小农特别是仍想种地的老年人的需求。52 岁的农户陈某，从外出务工的本生产队农户那里租了 2 亩旱地、4 亩水田，并于 2019 年买了价值 7000 多元的插秧机。据他说，村里农户有钱就买插秧机，本生产队有一半农户都购置了插秧机（20190524 陈 NT）。

3. 针对边缘生产者的点对点指导形成突围

在 W 镇下辖的 69 个自然村中，农业剩余普遍较多，小农是村庄农业生产的主体。与资本下乡排斥政府的农业服务体系不同，在相互比较中隐藏技术的特殊性的社会中，广泛种植西瓜、香瓜、木薯、糖料蔗、沃柑等各类经济作物但经验尚浅的边缘小农生产者，特别需要来自政府部门的技术指导。在经济作物的种植过程中，一旦某个环节错过了最佳时间，就会导致整片作物全军覆没。因此与“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自诩经验丰富的社会性小农相比，W 镇农业服务中心将那些游走在小农社会边缘、对“社会性小农”的某些特征深感无奈的农户定位为供给现代农业技术的主要对象。

W 镇农业服务中心对接农户以提供农技服务的方式，可以概括为“点对点指导”。具体而言，又有如下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对接村委、开设课堂教学点的方式。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定期到村委的课堂教学点讲课，村委会通知种植大户来上课，而其他农户就会跟着种植大户一起来到课堂。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会根据该村主要种植的经济作物品种，确定每次在课

堂的教学内容。

第二种形式是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或微信指导单个农户的方式。由于社会性小农不会相互交流技术，种植经验尚浅的农户在遇到种植问题时，就会通过电话或微信联系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W 镇的大部分种植经验尚浅的农民都认识乡镇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接到这些农民通过电话或微信而来的咨询。由于这些农民的文化素质较低、经验也不够，同一个问题经常会反反复复询问若干次，而且还容易忘记，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进行讲解。

第三种形式是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亲自进入瓜果种植较多的农村，到田间地头有针对性地指导小农种植经济作物。在通过电话和微信指导仍然无法说清问题时，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将免费到农民的承包地里进行现场指导。在某一种作物的种植户较多的情况下，农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一旦进入某一户农家的田地，身边就会立即聚拢其他同样种植该作物的农户。在指导完其中的一个农户之后，其他农户又会争相邀请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也去自己的田地看一看。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戏称自己的工作为“阳光工作”：“我们天天晒太阳。这些农户，好像你不进他们家的地就不增产一样。他们又不舍得拔一颗下来送过来给你看，你就必须到处走。”（20190529 何 ZR）

当然，点对点指导并不能有效对接那些自认为种植经验丰富的“老手”。这类农民已经成为成熟的“社会性小农”，他们务农时间较长，年龄也较大，很少去询问较为年轻的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要言之，在以小农为主体的农业型乡镇，农业服务中心通过利用干部的带动和示范、借用家庭发展观引导、针对边缘生产者展开点对点指导，从“社会性小农”的外围突破，利用“分类治理”的思维，有效撬动了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技术的衔接。

六、结 语

从事农技推广和农技服务的农业服务中心的一线人员对小农生产行为特征的最大评价就是“保守”。具体而言，小农行为在农业生产方面的“保守”主要表现为不轻易接受新技术、不相互交流和

分享自己的独特经验。在展开农技推广与农技服务之前,我们必须充分理解小农行为“保守”的生成机制,即小农究竟为何做出看上去显得“保守”的行为选择。本文所要重点强调的是,小农行为的“保守”是小农生产的社会性所塑造出来的。“社会性小农”的最大特点,就是在与他者进行比较的过程中定位和调整自己的生产行为。这种相互比较,使小农生产相互牵制,导致了小农行为的“保守”。之所以小农看重生产的相互比较,其原因可归结为如下几方面:

其一,小农在多变的自然环境中需要寻求风险共担机制。在长年累月的相互调整和摸索中形成的规律能够为小农生产带来稳定感和节律感,其背后则是小农心理上的安全感。从相互比较中产生的社会性,帮助小农通过趋近于一致的生产行动和无需繁复科学理论的直观思维,获得了对自然节律和因果关系的掌控感。

其二,小农生产高度嵌连在村庄社会潜在的竞争文化观念当中,换句话说,即高度嵌入村庄的社会角色认同构造和家庭分工之中。小农的相互比较,赋予了农业生产以表征人品、家格的象征性意涵,成为村庄舆论控制机制发挥作用的有效环节。而在广西平原地区的宗族性村庄中,小农生产也成为嫁入男系宗族的妇女之间开展“勤快竞争”的舞台,和努力支持丈夫在外务工并参与村庄公共活动的契机。

其三,小农生产也同时高度嵌连在村庄社会潜在的反竞争文化观念当中。也就是说,小农的相互比较,不仅可能是为了社会区分和社会竞争,同时也能反映社会整合的一面。通过在社会性的比较过程中显示与他者的“一致性”,在兄弟之间、农户之间故意隐藏自身技术的特殊性,就能回避小农生产中出现社会性竞争,从而发挥维护社会整合的作用。

忽视“社会性小农”的生产行为逻辑,将有可能降低农技推广与农技服务的有效性,无助于改变小农生产与现代农业技术的衔接不良状态。这是因为在生产风险、村庄结构和家庭结构的强势支配下,追求稳定和社会认可度的小农在面对新技术对固有生产秩序、生产观念和和生产经验所可能造成的冲击时,并不会轻易相信和接受新技术。农业技术本身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小农对农业技术的选择方

案是社会环境型塑的结果。

正因为如此,现代农业新技术的推广工作需要从“社会性小农”的外围寻求突破,充分运用“分类治理”的思维,将干部、种植经验尚浅的边缘生产者从“小农”群体中分离出来,同时顺应村民的家庭发展观,引导村民的农业机械消费。干部的示范和带头作用,边缘生产者对农技指导的渴求,家庭积累目标的分散以及父代在人生任务完成后向代际独立的转化,都在“社会性小农”的生产逻辑之外,为现代农业新技术与小农生产的衔接预备了空间。对于现代农业技术推广成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要方面的普通农业型地区,这些经验将成为解答现代农业如何衔接小农生产的有益参考。

注释:

- ① 普通农业型村庄在数量上具有绝对优势,其特点在于工商资本缺乏、土地流转困难、集中居住并不能带来耕地的集中,小农生产仍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 ② 徐勇曾提出“社会化小农”这一概念,用以强调个体小农与“社会化”大分工网络之间的嵌入关系。但该概念未涉及小农生产结构,无助于审视小农生产的运行逻辑。由此,杜鹏立足于小农生产结构,提出了“社会性小农”的概念,用来概括小农生产过程中农户之间互助协作、形成自发秩序的动力和潜力。在杜鹏的研究中,“社会性小农”虽然强调了小农生产的社会性,但基本强调的是小农进行社会协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笔者受杜鹏研究的启发,直接沿用“社会性小农”这一概念,但试图对小农生产“社会性”的内涵进行重新阐释。
- ③ “农业生产技术”包括长久以来社会性小农所选择使用的传统农业技术。“现代农业新技术”仅仅是“农业生产技术”的一类,而“农技推广服务”的任务是供给“现代农业新技术”。
- ④ 本文对访谈材料的编码信息规则为:年月日、姓、名的拼音首字母。
- ⑤ 在西方集体行动理论中,根据组织化程度的不同,社会行为从集体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到革命,可以组成一个发展谱系。其中,集体行为(collective behavior)处于最无组织性的一端,并且是自发而不可预测的,而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则是为了共同利益或计划所作出的协同努力。

参考文献:

- [1] 新华社·中办、国办印发《关于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意见》[N]. 农民日报, 2019-02-21.
- [2] 杜志雄. 家庭农场: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生产经营主体[J]. 农村经济管理, 2018(2): 32.
- [3] 徐旭初, 吴彬. 合作社是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

- 接的理想载体吗?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11): 80-95.
- [4] 霍雨佳. 市场化服务缺失下小农户与产业组织的深度融合研究——基于农业产业集群的小农户转型升级思考[J]. 农村经济, 2018(12): 79-85.
- [5] 申端锋. 集中居住: 普通农业型村庄的振兴路径创新[J]. 求索, 2019(4): 157-164.
- [6] 陈寨坚. 农业新技术推广与应用现状及对策[J]. 农业开发与装备, 2019(3): 37.
- [7] 林丽, 冯晓霞. 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发展探讨[J]. 现代农业科技, 2019(11): 250.
- [8] 曹艳丽. 浅谈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应具备的基本素质[J]. 农家参谋, 2019(6): 74.
- [9] 黄季焜, 胡瑞法, 智华勇. 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 30 年发展与改革: 政策评估和建议[J]. 农业技术经济, 2009(1): 4-11.
- [10] 胡瑞法, 孙顶强, 董晓霞. 农技推广人员的下乡推广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04(11): 29-35.
- [11] 《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研究》课题组. 中国农技推广: 现状、问题及解决对策[J]. 管理世界, 2004(5): 50-57.
- [12] 智华勇, 黄季焜, 张德亮. 不同管理体制下政府投入对基层农技推广人员从事公益性技术推广工作的影响[J]. 管理世界, 2007(7): 66-74.
- [13] 马克思.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M]. 中共中央编译局,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 [14] 恰亚诺夫 A. 农民经济组织[M]. 萧正洪,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6.
- [15] 詹姆斯·C·斯科特. 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M]. 程立显, 刘建,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 [16] 西奥多·W·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M]. 梁小民,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6.
- [17] Popkin S.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 [18] 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 [19] 陈健, 苏志豪.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 结构、模式与发展走向——基于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视角[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9): 74-85.
- [20] 郭星华, 汪永涛. 农民行动逻辑的演变[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2(4): 75-81.
- [21] 赵晓峰. 公私观念与传统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3): 106-112.
- [22] 费孝通.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23] 吴理财. 中国农民行为逻辑的变迁及其论争[J]. 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9): 22-30.
- [24] 徐勇, 邓大才. 社会化小农: 解释当今农户的一种视角[J]. 学术月刊, 2006(7): 5-13.
- [25] 杜鹏. 社会性小农: 小农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基于江汉平原农业发展的启示[J]. 农业经济问题, 2017(1): 57-65.
- [26] 戴维·波普诺. 社会学[M]. 李强,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 [27] 查尔斯·蒂利, 西德尼·塔罗. 抗争政治[M]. 李义中,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 [28] 易莲媛. “群众科学”与新中国技术政治研究述评[J]. 开放时代, 2019(5): 63-75.
- [29] 潘素梅, 周立. “一家两制”: 农户的差序责任意识与差别化生产[J]. 探索, 2015(6): 143-149.

责任编辑: 李东辉